

国际问题研究

合理的利己主义：中印关系 主体间性的活的灵魂^{*}

苏永旭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合理的利己主义是中印关系主体间性的活的灵魂，是解决一切国家和民族利益争端的一个重要价值准则。不合理的利己主义历来都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天敌、人类进步事业发展的天敌。中印关系主体间性的全面确立，将会为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找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合作的巨大的“场”，造福于两国人民。中印边界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主要是因为还没有找到通过双方智慧的妥协形成的合作的应有空间。实际上，如果双方能够进行换位思考，打破就事论事的狭隘思维模式，从两国人民的整体战略利益出发，通过合理的利己主义的自我调节，既能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又能超越历史、超越现实，就不难找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合理的主体间性，从而使这一问题得到最终的圆满解决。

【关键词】 合理的利己主义；中印关系；主体间性；中印边界争端；得失互补

^{*} 本文系2010年5月15—16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印度国际论坛”暨“庆祝中印建交60周年高端学术交流会”上的主旨讲演之一。

Reasonable Egoism: The Living Soul of the 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China-India Relations

Su Yongxu

【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reasonable egoism is the living soul of the 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China-India relations. It is one important principle of value in the solution to dispute concern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countries and nations. Unreasonable egoism is always the natural enemy both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rogress. The overall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China-India relations will enable the two great nations to seek out massive “fields” of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cultural and diplomatic cooperation to bring benefit for the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main reason for a tardy solution in vain to the boundary problem is that the deserved space of cooperation through compromise of bilateral wisdom has not been found. In fact, if both sides could think transpositionally, break the narrow thinking style of consider something as it stands, start from the overall strategic benefit of the people in the two countries, adjust ourselves through reasonable egoism, not only respect history as well as reality, but also transcend history as well as reality, it would not be so difficult to seek out the reasonable intersubjectivity to solve the China-India boundary problem.

【Key Words】 reasonable egoism, China-India relations, intersubjectivity, China-India boundary problem, complementation of gains and losses

我们一向认为，合理的利己主义是中印关系主体间性的活的灵魂，是解决一切国家和民族利益争端的一个重要价值准则。20 世纪 50 年代中印政治家周恩来和尼赫鲁两位总理共同创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至今还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日益为更多的国家所遵循，就在于其合理的利己主义的核心实质，对双赢、共赢、大家都赢这样一种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新格局的极富前瞻性的热诚向往。中印关系主体间性的全面确立就是要找到一个使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友好合作的理想的“场”和巨大空间，充分消除双方在诸多合作领域的相互猜疑和互不信任，放下沉重的精神包袱，轻装前进，互不为敌，互不构成威胁，有力地推进各自的和平崛起，造福于两国人民，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印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谁都不想打仗。为了更好地消除贫穷，日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展生产力，集中精力推进经济建设，我们都需要长期的周边和平环境和国际和平环境。20 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主体间性”这个概念，对人际交往和公众社会交往合作缝隙的执着寻找，对极端利己主义的无畏抛弃，为我们解决中印之间的分歧和利益争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智慧平台和无限的思维空间。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是不会有朋友的，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国家和民族也很难赢得真正的朋友，更不要说要赢得更多的朋友！当我们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时，很多的时候都是以合理的利己主义为前提的。不合理的利己主义从来都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天敌，从来就是人类进步事业发展的天敌！

中印建交已经 60 年了。这 60 年的风风雨雨，既给我们带来了沉痛的教训，也给我们带来了珍贵的启示。这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总结的那样：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印这两个国家已经友好了 2000 多年。这 2000 多年的文化交流已经使中印这两个伟大的民族血脉相连，水乳交融。公元前 2 年佛教从印度的传入，部分改变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它在同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融合以后，早已成为

中国智慧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这种文化交流的结果还使中国产生了一部天地人神鬼五界充分打通伟大作品《西游记》，它令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爱不释手。当然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入印度后也有有力地推进了那里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在有力推进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古代的黄河流域还产生了法显和唐玄奘、在现代的长江流域产生了谭云山、在印度近现代则产生了泰戈尔和师觉月等杰出人物。他们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20 世纪上半叶中印两国在争取各自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濡以沫，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仔细审视中印两国 2000 多年来文明交往的历史，除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由于边界争端引发的那场军事冲突之外，其他时间大都是和睦相处的。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于“八国联军进北京”、“甲午海战”、“中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引发的八年抗战那样的血海深仇。既然我们已经同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等这些与我们充满恩恩怨怨的国家关系都成功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并做到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同印度的国家关系就更应该超越历史，超越现实，登高望远，面向未来！当然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和人民较为坦然。而不少印度人对 1962 年的中印边境战争至今还耿耿于怀。实际上，中印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反对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维护人权和国家主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捍卫第三世界国家的合法权益等方面都有很多共同利益，而且在面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时也往往能够不谋而合，做出共同的抉择。这一切都足以让中印两国人民牢牢地站在一起！

然而又是什么原因不能使中印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时刻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印边界问题久拖不决。这不仅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也是中印两个巨人不能亲密拥抱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这个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中印之间诸多层面问题上的互不信任及其一系列简单问题的复杂化。由于边界问题

不能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有学者主张先推进两国在经济外贸、文化、学术等方面的交流，营造良好的氛围，创造条件，让其水到渠成，这一建议固然可取。但是这种曲线解决问题的方式过于缓慢，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我们要等 100 年吗？要等 30—50 年吗？实际上我们连 10—20 年都等不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些无谓的等待！更何况这种等待又是一种迫于无奈，不得不进行的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等待，它将充满了煎熬和磨难！因为每多等一年，我们两国的年经济贸易额增长的速度就会多放缓一年，中印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就会受到制约一年！为此中印双方都很着急，印方甚至比中方还急。印方早已同其周边的 11 个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就剩中国和巴基斯坦了。中方也早已顺利解决了同其周边的 15 个国家的陆地边界问题，就剩下印度还没有解决。双方都已充分认识到边界问题解决的迫切性，也都急于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更何况目前国际社会在分化组合、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充满了变数，很难预料它会把中印关系引向何方。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试图通过打“印度牌”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印关系随时都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边境地区摩擦的偶发，很容易导致事端升级，甚至演变为战争。我个人认为，既然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晚解决就不如早解决，而且解决得愈早愈好！有一个词汇我非常不喜欢，那就是动不动就要“搁置争端”。一些争端过于复杂，暂时搁置是可以的。譬如南沙群岛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东盟 10 国，的确特别棘手，要搁置可以理解。然而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只涉及两个国家，相比较而言，就显得较为单纯。这样的边界争端也要搁置，似乎就没有多少道理！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两国政治家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稳妥的双赢方案。因为中印政治家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从来就不缺乏智慧，只是在有些人的心灵深处多了几分狭隘的民族主义，过多迁就了公众社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遮蔽了他们智慧的眼睛！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印度政治家包括尼赫鲁在内一直向公

众隐瞒着中印边界战争发生前后的事实真相，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结果导致了双方多年的零点外交。但我们也注意到印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中国政府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中所给予的宝贵支持。后来才有了 1976 年中印关系的解冻和重大转折。这说明中印在骨子里仍然是兄弟。即使兄弟两个为了某种利益一时不慎大打出手，但也总有着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密！如果不是尼赫鲁总理迫于国内压力一味推行粗暴的单边主义，拒绝谈判，在当时就能够充分接受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善意方案，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如果真是那样，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印关系风调雨顺，不知道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多大的福祉！我们今天讲中印关系的主体间性，是说中印两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合作的巨大的空间、潜力和愿景。但要使两国合作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要使两国合作的巨大空间得以充盈，就必须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主体间性这样一个相互妥协的空间进行合理界定，拿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切实方案来！如果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个瓶颈不被打破，其他方面合作局面的突飞猛进就很难得到充分实现！俗话说：有所得必有所失。不可能整个都是“得”。世界上没有那么完美的事情！权衡利弊，如果我们得到是“西瓜”，丢掉的是“芝麻”的话，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印方也能够这样考虑问题，一切就都好办了。更何况一旦印方打破了传统的常规思维，能以平常心看待和最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时候，他未必就一定会吃亏。因为中印边界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真正划定过，双方都难以找到有说服力的法律依据，因此根本不存在谁吃亏，谁占便宜的问题。更何况印方在其他领域获得的“西瓜”和实际利益要比中国大得多，也划算得多。因此我们认为，一个只知道“得”，不懂得“失”，也不愿意“失”的民族，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一个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和“迂回”的民族，同样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一个只知道“锱铢必较”，得寸进尺，不懂得战略“妥协”的民族，更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有足够睿智

的民族！

我时常想，如果我们坚持克坚攻难，使中印边界问题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把横在中印两个巨人之间的隐患彻底消除，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活动空间将会荡然无存。他失去了对方作为一张牌来利用的价值，就只能把他弃之如敝屣了。我国西藏地区乃至西南地区的长治久安就有了充分保证。同时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睦邻友好也会给印度一个充分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中印两个国家的问题不存在了，印巴有关克什米尔问题解决的步伐也会大大加快。随着中巴印之间信任度的不断增强，印巴的边界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对印度本身而言，其由一个区域性大国晋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诉求和努力，也会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包括印度的核国家地位也会得到我们相应的认可。既然我们已经互不为害，我们已经亲密无间，印度政府希望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也一定会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成为现实。当超级大国和某些国家试图继续打“印度牌”遏制中国发展的时候，就会遭到印度这个伟大国家的自觉抵制。这也充分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因为印度从来就是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国家，从骨子里根本就不想受到任何一个强势或强权国家的摆布。当然中印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了，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的合作和交流更充分了、更深入了、更密切了，不等于说就没有竞争了，只不过这种竞争再也不会是互相遏制对方、互相制衡的恶性竞争，而成了一种充分互惠互利、共同繁荣、全面共赢的良性竞争，是一种充满着灿烂的和平阳光的良性竞争。因为竞争是人的天性、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天性。如果没有了竞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会止步不前。胡锦涛主席说得好：“中印未必非要成为一个对手。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具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实现和平崛起。”为什么中印这两个拥有 25 亿人口的伟大国家的年经济贸易额目前才只有区区 500 亿美元多一点呢？不要说我们同美国的年贸易额早就超过了 5000 亿美元，我们同欧盟的年贸易额 2010 年已超过 4000 亿美元，我们同韩国的年贸易额很早就接

近于 2000 亿美元。恐怕主要还是因为中印边界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双方的互信程度不够造成的。实际上中印在现实的诸多交往中坐失商机的情况的确时有发生，十分令人可惜。我们相信，随着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两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和印度经过 10—20 年的努力，双边年贸易额怎么也会突破 3000 亿美元大关。届时一定会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反之，如果我们相互提防，相互猜忌，总是针尖对麦芒式地较劲，把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多年来形成的经济积累的相当比例都拿去搞军备竞赛，那我们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早晚都会跌入灾难的深渊！

好在我们欣喜地看到，1976 年中印关系解冻以来，尤其是 1988 年中印关系在经过了 15—16 年的极度困难时期重新走向正常化以来，中印两国领导人都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保持了较多的高层互访和沟通。仅因为边界问题的不同层次谈判就进行了数十次之多。尽管还没有出现大的实质性突破，但是 1993 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时双方签订的《维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协定》，1996 年江泽民主席访印时双方签订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3 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时双方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等，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 2005 年 4 月温家宝总理访印前达成的《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2006 年 11 月胡锦涛主席访印时提出的“促进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点主张”，2008 年辛格总理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所达成的重要共识，更是为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目前解决边界问题的三个机制：中印联合工作小组、边界问题专家委员会和特别代表三个层面的谈判日趋活跃，也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不少新的希冀。印度方面一些有识之士对 1962 年中印战争的反思及其随着尼赫鲁决策时期有关内幕材料的充分披露，也使很多印度人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印度方面也不再坚持“麦克马洪线”的不可动摇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对方

坚持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解决边境争端的根本意图，较之“麦克马洪线”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帝国主义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时期通过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形成的“麦克马洪线”，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承认过，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肯定不会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决不会予以认可！有专家认为“麦克马洪线”的打破是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和基本前提，是非常富于建设性的。^① 我们知道，中印对中段边界双方意见比较一致，而对西段和东段边界分歧较大，而且对东段边界分歧最大。问题就集中在“麦克马洪线”要不要突破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使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呢？我们认为，充分引入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想，尽快捕捉和确定中印边界问题的主体间性，充分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解决问题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根本途径。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一厢情愿而又蛮不讲理的单边主义则是这一途径顺利实现的最大障碍。同时我们还要放眼世界，从两国关系的整体利益和全局出发，摆脱就事论事的狭隘思维模式，寻找双方合作的主体间性，拿出双方都能够看好的并乐于接受的方案。如果印度方面一味死抱着现有的实际控制线不放，寸土不让，绝对无助于该问题的解决。但不知印方想过没有，如果中国方面也一味在印度期望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问题上行使否决权，那么印度由一个区域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强烈诉求和愿望也就不可能成为现实。这就需要印方在确立中印边界关系的主体间性时仔细斟酌，大胆抉择，能够做出某种程度上的智慧的妥协。更何况随着两国的快速崛起，中印双方的合作也愈来愈具有全球意义和性质。这就使我们什么时候对这件事情都不能小觑。这就更需要双方统揽全局，放眼世界，放眼历史和现实，尽快找出两国边界的利益切合点。实际上，如果我们能进行换位思考，多为对方着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合理的主体间性就不难找到，并一定能够真正确立起来！

①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周刚等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然而要使这样一条路真正走得通，有几个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

第一，互谅互让，取舍自如，互利共赢，得失互补。双方都要敢于对那些貌似不能妥协的事情进行果敢的妥协，灵活机动，进退有致。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中有退，退中有进。对部分边界做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相应调整。有时候“进攻”是美，“妥协”是丑。可有时候适度的“妥协”还是一种智慧，一种美，一种伟大的耀眼的历史光芒！这需要双方的政治家具备一种巨大的政治勇气。尤其是印方政治家，要敢于丢掉英殖民主义者留给他们的沉重的精神包袱，轻装上阵。

第二，对合理的利己主义予以充分尊重，对不合理的利己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简单粗暴的单边主义必须予以坚决抵制和反对。尤其要充分尊重对方合理的重大关切。譬如达旺问题，中国方面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印度方面应该无条件将其归还中国。中国方面可以给予搬迁的印度居民充分的经济补偿。^①决不能以那里有印度居民的房屋、财产、行政区划为由，阻挠这一历史进程。作为回应，中国方面可以在中印西部边界上做出一些让步，把部分领土划归印度。印度方面也应该对该区域生活多年的中国居民的搬迁给予充分的经济补偿。另外中国的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给予充分的关照，并在印度签署了《国际核不扩散条约》等重要文件之后，对印度的核国家地位予以充分认可。

第三，要敢于超越本国媒体和民间舆论诸多杂音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开阔政治视野，把它们引导到中印友好的正确轨道上来。我2010年12月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参加中国—印度国际论坛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听到了“现代唐玄奘”谭云山之子谭中先生讲的一句话：“远古的时候世界很大，人心也很大。现在随着交通

① 国内学者王宏伟等人也持类似看法。

工具的发达，世界变小了，人心也变小了。”这使我深受启发。我一直在想，也许在我们这个“世界”不断变小的时候，中印两国政治家的“心”能够变得稍微“大”一点，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龙泉寺学诚大法师也讲有一句话，说是：“心小了，事就变大了。心大了，事也就变小了。”也让我若有所悟。以前中印边界问题之所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主要是因为两国政治家的“心”太小了。随着中印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家的“心”日益变“大”，这个问题日益变“小”，中印边界争端问题的最终解决就应该是必然的了！

第四，高瞻远瞩，着眼未来。既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还要能够超越历史，超越现实。争取完满解决，不留后遗症地解决问题。印度和中国的国情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具有质的差异。中国在解决同周边 15 个国家的边界争端时，都是以不承认历史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的。而印度在解决同周边的 11 个国家的边界争端时，则是在继承英帝国主义在那里统治了近 200 年的遗产的基础之上的。这对他们在 1947 年印度独立后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印度在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时候，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不是斯里兰卡、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弱小国家。因此印度方面必须调整相应的思路，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回到务实高效的现实轨道上来，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总之，一句话，如果我们抓住了中印边界问题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强力推进，能够来一个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中印关系的一切不利局面都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倘能如此，便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无数把锁！”

最后，我们真诚地期望这个伟大时刻尽快到来！

苦难与反抗

——浅析殖民经济体系对东南亚的冲击

许瀚艺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回顾 15—20 世纪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以及被殖民过程中新经济体系对本土经济体系的冲击,分析这一过程中东南亚诸国所经历的种种变革,解读新经济体系下劳动人民所承受的苦难,以及对这种苦难所作出的反应。

【关键词】 殖民经济; 东南亚; 农业经济

Suffering and Revolt: A Brief Analysis of Impact of the Colonial Economy to Southeast Asia

Xu Hanyi

【Abstract】 During the 15th to 20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 has gone through the Age of Trade and Age of Colonial which brought a huge transformation for them. In this paper I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reforms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Trade and Colony,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reform which brought a lot of suffering for local people and how they reacted to the suffering.

【Key Words】 colonial economy, Southeast Asia, ag-

agricultural economy

15—17 世纪的东南亚被称作贸易时代的东南亚，东南亚的香料等特产作为商品借助一条条航路远销世界各个角落，正因如此，东南亚成为了早期西方国家海外扩张的众矢之的。一直以自然经济为传统的东南亚诸国在发展海外贸易的过程中经济体系逐渐发生变化，直到西方国家海外殖民的展开，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体系开始发生某些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仅仅从经济体系上研究，而忽略了这种变化对个体的人的影响，并不能体现出新经济体系取代本土经济体系之初到底在生活层面产生了什么影响，也无法体现出作为个体的人对这种新经济体系是如何表现出不适而最终做出反应的。在殖民过程中西方经济体系严重冲击了东南亚诸国的本土经济体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表现，而马克思本人则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这种考察方法（唯物史观）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的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

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殖民经济体系下东南亚地区人民所历经的苦难与反抗方面，意图说明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要付出重大代价的，而人则是这一过程中主要的受难者。

一、东南亚的传统经济体系

东南亚地区的地理特征明显，其主要的自然单元为水和森林，而这两者则决定了无论是东南亚诸地区之间抑或是东南亚与其以外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第17页。

地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很晚才出现统一政权，而中南半岛的平原地区情况相对要好，在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建立起了以婆罗门教文化、佛教文化或者汉文化为主导的与本土文化充分结合的诸多统一政权。虽然受到地理上的阻隔，但东南亚诸地区却没有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文化单元，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东南亚诸地区在文化与生活习惯上的共同性便可以发现，东南亚地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圈存在的。比如，东南亚地区的人都信奉万物有灵；饮食结构都以鱼、米、棕榈酒为主，肉和奶制品为辅；东南亚人都喜爱咀嚼槟榔；住房都是杆栏式的建筑；广泛以斗鸡和藤球作为娱乐消遣……有人指出这是由于东南亚地区相似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然而仅凭自然环境这一单一要素并不能解释这种文化的相似性。例如，人们普遍嚼食的槟榔就不可能是对该地区槟榔树相同的自发反应，因为槟榔果、萎叶和石灰这三种原料必须经过复杂的调配才能达到理想的口味。^①

为了了解东南亚地区传统的经济体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生活在东南亚诸地区的人是如何获取生存资源的。早期的东南亚地区地广人稀，生存资源相对丰富（当然也是绝对丰富的）。这里所谓的生存资源主要包括三种：人、土地（包括河、湖、海洋等）、产物（包括作物和猎物）。人，作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资源是统一政权和聚落社会都迫切渴望的。无论是对于统一政权抑或聚落来说，更多的人意味着生产力和分工可能性的提高，更多的人也在遇到自然灾害与战事时保证了政权与聚落的安全。土地，如果按照三种资源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的话，土地其实应该排在末位，因为东南亚地区最不缺少的就是土地资源。而东南亚缺少的是利用这些资源的人，在大多数地区土地几乎是可以随意占有的，但是东南亚人对私人与公共的概念却区分得很好，任何人都可以在任意土地上从事生产或者渔猎，只要之前这里并未被别人

① [澳] 安东尼·瑞德著，吴小安、孙来臣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860 第一卷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页。

声称占有。产物，东南亚最主要的农业产物是稻米、西米和天南星科类作物（其具体种植情况将会在后文解释），同时森林与水域中的动物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的。比如，古代菲律宾群岛的居民在捕鱼时，只需要将捕鱼器放入水中便可离开从事其他工作或者在旁边休息，不久后便会有所收获。

生存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东南亚人的农业模式也具有其特点。稻米是东南亚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少数土地贫瘠的赤道地区则种植西米棕榈，也有部分地区种植天南星科植物。东南亚的稻米种植方式分为干、湿两种，前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刀耕火种。当地居民先焚烧一片树木，在焚烧过的土地上挖出一个个小坑将稻种放进去并埋好，这样一来稻米借助焚烧树木所产生的肥力以及当年的雨水生长，一般来说这种种植方式通常出现在聚落社会中。在统一政权管辖区域下，由于有统一的管理和稳定的灌溉系统，稻米种植往往采用精耕细作，可达到一年两到三熟。为什么水稻种植模式会与社会模式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呢？聚落社会中的人与统一政权管理下的人相比具有迁徙上的便利，在面对广大未开垦的土地以及较少的稻米需求时，游耕与刀耕火种的结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节省人力资源。同时，游耕也是避免被统一政权划归于其管辖之下的一个有效办法。而在统一政权管理下的人则不可避免地采用定居农业，因为税费的征收要求他们每年必须保证一定的产量，同时定居农业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合作成为可能，从而降低生产风险并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作物甚至剩余作物。至于种植天南星科植物的族群则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美国学者斯科特曾经提到过一种叫做“逃避农业”（escape agriculture）^①的种植模式，这些族群并非在技术层面上不能种植稻米，他们之所以选择种植天南星科植物作为淀粉摄取的来源，是因为天南星科植物埋在地下不易被统一政权进行征收，同时他

^① 王晓毅、渠敬东编：《斯科特与中国乡村：研究与对话》，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